



走读社运 工作坊讲义



目录

缘起	3
活动流程	4
如果和平抗争有效，谁不想要和平？ / 白慧琪	5
作为公民社会的枢纽 / 黄康伟	8
威权崩溃以后，我们的改革运动 / 黄康伟	10
社运地标：多元的磁场 / 林宏祥	13
净选盟集会的隐形基地 / 饶兆颖	15
百年茨厂文化遗产保存行动 / 杨两兴	17
向 118 摩天大楼说不 保留区传承独立精神 / 谢伟伦	21
占领广场：开拓民主的想像空间 / 朱进佳	26
走过 10 年更坚定立场	29
饶兆颖：法律应以罪犯修复为出发点 / 郑宇晴	29
赵明福命案的永劫回归 / 黄业华	32
马来西亚淨选盟，十年来的感动与挫败 / 黄进发	35
推荐书目	43

缘起：请大方踩过前人的道路，成为改变社会的动力！

社运是什么？在今天的社会，我们是否还需要社会运动？

马来西亚自 1990 年代以降，都市高度发展。乡村的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只为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然而，光明的背后总是黑暗的。一党独大，贫富悬殊，让这块土地既受着民主不发展之苦，又受着经济过度发展之难。

于是，人民群起抵抗。既有贫民对抗资本强取豪夺，也有民权份子联手政治精英，打开民主化之路。一时，威权受到挑战，大地烈火莫熄。

这两条反抗路线，一条是社会运动，以街头抗争路线为战场；另一条是政治运动，以选举及议会政治路线为战场。两者尽管目标不同，却在威权的压迫之下，逐渐汇整成为人民一步步「走过民权的道路」。

此工作坊名为「走读社运」工作坊，正是希望带领参与者走访本地当代的社运地标，通过经验分享深入了解社会运动背后的故事、挑战及发展脉络，探索其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角色。

导览活动以隆雪华堂为起点，邀请持牌导游梁莉思带领参与者走访关键社运地标，通过这些地点重温 1991 年至 2022 年间的社会运动发展历程。

我们也制作了「走过民权的道路」社运地图，用图像描绘曾经走过的足迹。

而这份「走读社运」工作坊讲义则是梳理社运及其产生的背景。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归纳为三个提问：

一、什么是社运？国家、政党政治（人物）与社会运动（份子）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社运怎么办？马来西亚民主转型中的社会运动变化。

三、如何社运？社运案例分享。

同时，我们也邀请社运人士如饶兆颖、黄业华、黄进发教授、黄康伟分享他们的实践与见解，激发对社会议题的多元思考，及反思如何以自身力量推动社会改变。最终，我们希望从在地的角度，激励青年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助力本地社运的发展。

如今，威权轰然倒下，民主却混沌不明。狂飙一梦，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终究有分道扬镳的一天。走上街头不只是改革的手段，而是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回顾历史是为了梳理现在。请大方踩过前人的道路，成为改变社会的动力，继续往民主与人权的道路前进吧！

活动流程

时间	活动
8:00am	开始入场（早餐）
8:30am	自我介绍、破冰和主题介绍
9:00am	《走过民权的道路》导览活动 / 梁莉思 集合地点：隆雪华堂
12:00pm	午餐
1:00pm	马来（西）亚社运回顾 / 黄康伟
1:30pm	废死运动中的舆论策略与组织团结 / 饶兆颖
3:00pm	茶点
3:20pm	体制改革的困难：赵明福民主促进会 / 黄业华
4:50pm	小休
5:00pm	Bersih2 集会：「寻找民主，找到国家」的街头奇遇记 / 黄进发
6:30pm	讨论与总结
7:30pm	晚餐

如果和平抗争有效，谁不想要和平？

白慧琪（《星洲日报》「活力副刊」记者）报道

2019 年的 6 月至 7 月，香港不平静，反《逃犯条例》（反送中）运动至今持续发酵。2400 公里外的马来西亚也在关注，不妨回忆你我对这场运动的关注从何开始？是 7 月 14 日警民流血冲突、7 月 1 日冲击立法会、6 月 16 日的 200 万+1 人、6 月 12 日警民冲突，还是更早以前 6 月 9 日百万人游行、5 月份香港不同领域人士的联署反对、4 月 28 日的 13 万人游行、3 月 31 日万人上街……

谈起抗争，马来西亚人或许不禁联想起过去轰轰烈烈，10 年内的 5 场「净选盟」集会。坊间不少人拿此次香港抗争与净选盟运动相比，有人批评暴力，有人上街声援。一场抗争运动带来两极舆论，或许是因为各造对社会运动（社运，Social Movement）的想像不一。

社运是什么？马来亚大学国际关系与策略研究系高级讲师邱颖慧提醒，社运没有既定模式，采用什么方式、策略都因应政治情况、当权者反应而不断调整、进退。看待近来香港的示威活动，也应从当地政治现况和运动长远发展来分析，不能与马来西亚情况直接比较。

「社运在马来西亚也不是新鲜的东西。」马来亚大学国际关系与策略研究系高级讲师邱颖慧解释，「社运」的定义其实很简单，一群人聚首为同一个目标抗争的集体行为。

早在马来亚时代，反殖民运动蓬勃，1947 年的大罢工（Hartal）抗议英殖民政府提出的联邦宪法。独立之后，1960 至 70 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98 年「烈火莫熄」（Reformasi）、2007 年至 2016 年的 5 场净选盟集会（Bersih）、2018 年反《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集会、今年 3 月份的国际妇女节游行，都是一场场运动。这么随手一列，社运在马来西亚真的不是新鲜事。

然而在马来西亚「Protest」（抗议）、「Movement」（运动）似乎是被污名化的字眼，人们一看就觉得不应该，甚至认为在「反政府」。其实不然，看看从前美国发起女性罢工争取女性投票权、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维权运动，都不是反政府，而是争取权益。

会有「反政府」的误解，邱颖慧认为是长久以来，我国教育制度并没有把示威、运动当作正确行为。最直接的例子是净选盟运动，不时被时任政府强调为非法活动，「上街抗争不是这里的文化，是西方的文化。」以声援巴勒斯坦游行为例，同样是示威活动却被允许进行，就可明显比较出过去政府对示威活动采取双重标准。

「若谈真正的民主，抗议并没有问题，而且警察的责任是「Facilitate」（促进、方便），确保示威活动和顺利进行，而不是「Control」控制。」

另外，一场社运发展开来，有时会引发反制运动（Counter Movement），譬如净选盟4.0集会后的「红衫军反净选盟运动」。一场运动影响力够大，才会有反制运动。社运也可以发展成政党。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催生了公正党；香港新政党香港众志（Demosistō）也是在雨伞运动后成立的。

社运，不只上街而已

当然，请别以为社运只是上街，那只是其一手段。你我可以想到的名词：示威（Demonstration、Rally）、游行（March）、罢工（Strike）、占领（Occupy）、集会（Assembly）都是社运不同手段，来抗议（Protest）和争取某些事务、权益。平静低调一点的方式有发起请愿（Petition）或发表文告（Statement）。也有社运始于非常激烈的方式。2010年突尼西亚一名青年自焚后爆发「茉莉花革命」，进而发展成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

选择什么抗争手段，胥视当下政治情境和局势转换、表现手法的意义和效果，以及时机。

邱颖慧举了3例：1999年「西雅图风暴」（Battle of Seattle），示威者包围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现场、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学生占领立法院，以及此次香港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它们的共同点是，示威者要阻止立法议员讨论，而政府机关是立法场所，具象征意义。」

社运往往选择别具意义的日子，例如香港冲击立法会发生在香港回归

纪念日。2015年净选盟4.0在独立日前集会倒数，为表达国家尚未真正独立。

再来，社运手段讲求吸引注意力，最好获得媒体曝光。这不免让人想到「红衫军」领袖嘉玛尤诺斯，又是砸酒瓶，又是穿浴袍。当嘉玛的动作越来越多，有些人开始提议别再报道他的新闻，增加他的曝光率。不过，邱颖慧认为，他背后有靠山是公开的秘密，不能和真正的社运相提并论。

冲击立法会不是Violence，而是Disrupt

每当社运发生冲突，媒体常形容「抗争行动升级」，邱颖慧不以为然，称之为「策略改变」（Change of Strategies）。「如果和平抗争有效，当然会继续，谁不想要和平呢？」社运最重要的是持续施压，当情况有变，原本抗争方式行不通，才会换另一个方式继续争取。

她观察，香港抗争一开始是和平的，但是香港政府先是忽视，坚持二读，后再宣布「暂缓」条例，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搁置」条例和其他诉求。原本和平抗争没有效果，他们才不断改变策略。

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被诟病为暴力行为。邱颖慧不觉得那是「Violence」（暴力），而是Disrupt（破坏、干扰）。她举出暴力抗争的例子是阿拉伯之春，伤亡惨重。

再以净选盟组织为例，一开始他们以搜集选举舞弊，举办论坛、推广选举教育为主。「其实他们想见选举委员会（去提出诉求），但是见不到面。」

当这道门被关闭，净选盟才采取其他方式。最终，2007 年第一场净选盟运动的出席人数出乎意料，也为 2008 年的 308 大选带来冲击。

净选盟运动一直强调和平，与马来西亚的政治氛围息息相关。「种族冲突的阴影还在每个人脑海里，政治人物也会挑拨种族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点差错都会被当时的政府放大「暴力」。」考量得失，采取激进手段只会让更多人不再支持净选盟运动，是以主办方一直强调和平。

当时政府也常指净选盟运动支持者多是华人。面对这种情况，净选盟 2.0 当时由印裔的安美嘉和巫裔的沙末赛益共同领导。从一开始马来西亚人不太能接受「上街示威游行」，到后来剔除种族困扰，成功号召各族群上街，她认为，净选盟运动是借由网络社交媒体动员、1MDB 丑闻和马哈迪在巫裔群体的号召力。

「上街」容易，退场难

社运其实也是抗争者与当权者的心理战。抗争者诉诸什么行动，当权者如何回应，都会互相影响下一步动作。

净选盟集会始于 2007 年，刚进入前首相阿都拉时代，他的个人形象比较随和，也强调改革。从马哈迪踏入阿都拉时代，政治氛围转变，公民社会有较大的空间。「当时对政治不满的人已经很多，非政府组织、反对党都认为应该要把握机会，所有的不满和怨气终于有地方发泄。」

一场运动爆发，当权者镇压往往会有两种效果，一是噤声，人民真的非常害怕，不继续运动；二是适得其反，镇压得越用力，人越不怕。一开始，净选盟运动受到政府大力镇压，结果是人们更加愤怒。

邱颖慧解释，政府起初逮捕很多人，人们反而觉得有伴，心理也不那么害怕。当净选盟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政府反而不怎么逮捕人，让人觉得上街不能带来改变，感觉抗争集会像是嘉年华。就算逮捕，政府只逮捕时任净选盟 2.0 主席玛丽亚陈一人。不过时局已经改变，政府此举的效果不大。

倘若社运维持好长一段时间仍僵持不下，该如何退场？邱颖慧直言，「很难说。」马来西亚的情况，烈火莫熄运动因为安华入狱而默默退场，净选盟运动时示威还是「违法」的，因此维持限时解散方式。

一般退场机制不会只有一种计划，主要得考虑诉求能不能达成，长期抗争需要很多资源，抗争者能撑多久抗争者一直看不到结果也会产生政治疲惫（Political Fatigue）。邱颖慧提醒，此时民粹主义很容易崛起，人们等得不耐烦，而倾向支持民粹主义，诉诸最快而简单的方法。她举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广杀毒贩来解决毒品问题，便是这样的逻辑。

编按：本文刊登于2019年7月18日《星洲日报》
「活力副刊」，欢迎浏览
<https://www.sinchew.com.my/?p=2901177>。

作为公民社会的枢纽

黄康伟（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秘书）撰述

社会浪潮一波又一波地冲刷，搅动着我们这块土地的发展。

就马来西亚社会运动而言，我们可以简单将之分为四个阶段：一、马来人特殊地位课题；二、党国确立后的伊斯兰主义复兴及中产阶级的崛起；三、高速发展下的都市贫民抵抗；四、政治与社运联盟，开启民主转型。

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课题，从首个阶段开始，就在这块土地上翻腾。

「谁是我们？」，这是初生新兴国家面对的一大难题。即使确立了「我们」，对于有着不同文化、语言及生活习惯，却拥有同个国籍的人们来说，如何「差异而平等」亦是非常困难。

这个问题，犹如马来西亚社运的主旋律。从林连玉到林晃昇，众多华社领导都曾为之努力，（隆）雪华堂犹如局内人一般，见证事件的发展。

宗乡团体联合体的转型

诚如历史学者何启才所言，华社自始就有结社的传统，借由设立会馆社团等民间组织，实现自我管理，乃至集体动员的动能和能力。因此，当面对国家机器所制定的种种不平等对待时，华社的反应较突出，动员力量也较强。

也因此，华社在资本与文化的双重打压之下，长期的苦闷终究迸发出1980年代的一系列民权改革思潮，实现传统宗乡团体联合体的公民社会转型。

从《国家文化备忘录》（1983）、《华团联合宣言》（1985），再到推动15华团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巡回宣扬扬主人权观念，无不是在夹缝中联合各方力量，一步一脚印革新社会。

当然，隆雪华堂作为传统宗乡团体联合体，转型与蜕变成公民社会枢纽（Hub），并非是一帆风顺。当中，有保守势力的反扑，亦有对目的与策略的不同诠释。

1998年，时任副首相安华遭到首相马哈迪政治迫害，「烈火莫熄」点燃社会积压已久的怨气。政治与社运联盟，也开启民主转型之路。

从吉隆坡义山墓园迫迁、《诉求》、白小保校运动、收购《南洋商报》引发的「528报殇」，到净选盟和反莱纳斯集会，隆雪华堂是人民起义时，商议及开展公共讨论的场域。

如今，马来西亚历经2018年首次政党轮替，也见证希盟政府的瞬间崩塌。喜来登政变、疫情肆虐，国家在睡眠惺忪中陷入迷航。

人民不禁想问：我们到底是谁？政治很乱怎么办？民主是不是真的比较好？——这都是民主转型阵痛期所发出的哀鸣。

当社运退潮，隆雪华堂依旧中流砥柱。

身体与思想无法自由穿行，所幸科技的发达使得公共讨论得以从实体搬到线上，催生出「天下事，线上看」；而民权委员会及隆雪华青也在线上举办「人权月」工作坊，持续肩负传播民主思想的重任；民权委员会更是常年配合及参与 513 事件公祭仪式，并举办系列活动，与记忆、遗忘抗争。

族群融合与社运转型

诚然，走过风雨路，百年华堂依旧面临多重挑战。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球就在我们的脚下。

我认为，就华社及隆雪华堂的角色来看，至少可以从两个方向继续讨论。

一、国族到社区共同体：「我们是谁」是从二战以来，困扰马来西亚的紧箍咒。党国不断以马来人为核心，打造官方国族主义，可惜都不算成功。民间如何从社区出发，立足地方，发掘本土文化，促进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应视为当务之急。

二、公民社会的（持续）转型：自由与平等是人民长期追求的目标。如今，马来西亚进入民主转型的阵痛

期，各方势力仍在搅动。公民社会如何因应时局转型，改变抗争策略，尤其关键。隆雪华堂如何在现今组织架构中，持续保持活力，寻找民权接班人，深化民权运动亦为重要。

如今，传统宗乡团体联合体面对青黄不接、俱乐部化等问题。

有者以传承文化使命为己任，这当然不失为一条永续经营的道路。然而，面对变化莫测的民主转型期，如何在保障文化自主权的基础上，保障政治自主权，则必须仰赖公民社会之壮大。隆雪华堂作为推动公民社会进步的角色，值得传统宗乡团体联合体学习与超越。

而纵观马来西亚的社会运动史，隆雪华堂之成就绝非偶然。我们是一副又一副争取自由与平等的肉身。我们以自己的生命汇集成民权的河。我们既冲浪，也造浪，相互交替，浮浮沉沉，与隆雪华堂昂首游过一段又一段艰难的时刻。

编按：本文为「隆雪华堂百年庆」系列文章，由隆雪华堂组稿，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刊登。

威权崩溃以后，我们的改革运动

黄康伟（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秘书）撰述

纵观我国自 1998 年烈火莫熄运动以降之改革运动，不外乎三条路线：

一、以选举及议会政治路线为战场；
二、以街头抗争路线为战场；三、两条腿走路，即以街头抗争为手段，选举及议会政治为目的，结合各方力量打破以国阵—巫统为首的党国威权体制。

在政治高压的年代，一般民众由于担心受到政治迫害，大多不愿意投身改革运动，只愿意当一名「投票观众」。选举及议会政治路线上，专业的政治工作者透过选民的委托，进入议会扮演「人民大声公」的角色，或多或少在那个困顿的年代掣肘巫统。

然而，议会政治只局限在五年一次的群众动员，党国治理却处处展现滑稽与荒谬。面对不平等待遇时，人民群众也会在组织者的协调下，于时局窘迫中走上街头示威，表达自己的声音，例如白小抗争、反高压电缆运动等运动。惟，街头抗争不一定会转换为选票。

随着 2008 年 308 政治海啸，人民对于党国体制日益感到不满，以净选盟为首的非政府组织发动群众，配合在野党的动员，

上街抗议表达选举改革诉求。人民以「两条腿」，寻求置换巫统的可能，最终在马哈迪与纳吉两派政治精英分

裂后，我国终于在 2018 年，迎来首次政党轮替。

由此可见，虽说是三条路线，其核心皆是国家与民间二元对立的模式。此时的政治社会（在野党）与民间社会紧密难分，民间社会源源不绝的动员能量正推动改革运动体制化。

三元模式的形成

党国威权体制瓦解，希盟成功入主布城之后，迫使巫统与其他政党一同竞争。巫统固然可以在西敏寺议会制的框架下，发动喜来登政变夺取政权，但 2022 年的全国大选已经证明，即使是曾经呼风唤雨的巫统，如今也必须是在选民的考验下求存。

至此，国家、政治社会及民间社会三元模式俨然成型。

一方面，不少改革运动者选择加入政党，或进入国家体制，以选举或幕僚的方式，试图改造国家。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选举皆陷入三角或多角战，从而导致政治人物在选举时如坐针毡，而各政党（联盟）皆有可能入主布城，掌控国家政权。

正因如此，政治精英需要争取选民的支持，人民也有更大的改革倡议空间来表达诉求。于是，曾经作为改革运动发动机的净选盟抓准这段民主转型的混乱期，逐渐蜕变成议会民主改革倡议团体。此路线以范平东为首，

称之为人民体制（People's Institution）路线；与之对立的是以黄彦铭为首的人民运动（People's Movement）路线，以组织群众，走上街头抗争为最大目标当下，我国陷入族群及宗教政治之危机，即舆论称作的「绿潮来袭」。非政府组织者固然患上「焦绿症」，实则担忧的是我国不完美的自由及世俗体制遭到侵蚀。人民运动路线如今在净选盟内大胜，黄彦铭（及其领导的团队）会否带领人民走出泥潭，值得期待。但更关键的是，民间社会能否在此路线下自主及茁壮，走出过去 20 年以来「以选举及议会政治为目的」的框架呢？

固然，人民体制路线有其对安华掌政的过度乐观，但两条路线本就是社会运动的一体两面，二者不可偏废。街头抗争路线需要与各个政党协商，进而表达倡议与诉求。倡议与诉求同样需要人民现身街头施压，展现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也迫使国家及各个政党重视，并介入事件及议题。简言之，国家、政治社会及民间社会，三者互动才能推进民主运动进展。

无论如何，我们如今能够看到，民间社会在疫情后，持续有更多的议题展开：性别、环境、跨族群及社区等，路线上也不只是局限在选举及议会。其规模虽不能与昔日净选盟及绿色大集会相比，却在「无大台」的状态下积极培力（empower）自主公民。

守住共同的底线

如今，党国威权已经褪去，新的威权依旧有复辟的可能。

当下的民主转型期间，国家内部犹如拼装车一般组成团结政府，「自动行驶」在民主转型之道路；政治社会则是精英分裂，大有走偏锋如沙努西之辈，以民粹语言动员群众；民间社会则如刚刚萌芽，如履薄冰。

我在此提出三条底线，盼民间社会在关键时刻共同守住。纵使此举不一定可以使我国经济腾飞，也至少不造成生灵涂炭，陷入政治价值崩溃以后的虚无主义疯狂。

一、自由宪政的底线：我国自 1955 年以后，定期举行选举，宪政也在混乱时刻中，屡次发挥稳定大局之作用。其虽有不完美之处，却需要民间社会持续提出改革方案将其完善，成为我国完成民主化进程之稳定剂。

二、世俗政治的底线：政治狂人以宗教之名，行威权复辟之实。其一方面导致我国民主化之（可能）倒退，另一方面撕裂不同族群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守住世俗政治之底线，尊重不同公民之身份认同，才是不同群体之间对话的催化剂。

三、自主社运的底线：社会运动乃人民自由集结之成果，也是社会与国家对话之机制。自主的社运才有空间使得人民有机会彼此对话，形成社会共识，扫除过去「强国家，弱社会」之弊端，形成公民社会的粘着剂。

诚如刘瑜在《可能性的艺术》所言，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我国人民在后疫情时代再次走在历史的交叉口。

如何活在当下，而非昔日的辉煌，善用改革倡议的民主空间，避免国家陷入地狱，或永无止境的莫比乌斯环，甚至重建马来西亚，乃自主社运之时代任务。共勉之。

编按：本文为 2023 年人权月系列文章，由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组稿，刊登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当今大马》。

社运地标：多元的磁场

林宏祥（大同工作室行政主任、时评人）撰述

追溯历史，本地华团早年为方便规划与推展会务、凝聚会员，于是购置或兴建会所，以本身固定的活动空间，建立安全感与归属感。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建筑乃此传统历史产物，惟在百年政治与社会变迁中，也成了见证及参与创造历史的地标之一。

上个世纪，本地华人主流政治力量多数时间在野，早习惯以非官方场地、非财团空间为阵地，商议对策、抒发异见、集结抗议。然而，对于长期依赖官方资源的马来政治主流力量，要等到 1998 年正副首相决裂、安华遭罢黜、「烈火莫熄」运动爆发后，才意识到独立空间的重要。

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尚未发达、普及化的年代，实体空间显得格外稀罕与珍贵。在很长一段时间，当权者全面封杀，经不起威迫利诱的场地业主拒绝租借场地——隆雪华堂于是成了在野马来政党、非政府组织、知识圈的最后栖所——这个处于吉隆坡闹市中心的白色建筑，渐渐成了时事讲座、重要社运议题记者招待会的首选场地，偶尔孝恩室有小型的知性讨论会，而光前堂、首都剧场皆办过造势大会。

隆雪华堂于是从「华人集聚」的场所、「捍卫民族权益」的阵地，升华成「马来西亚公民集结」的场所、「捍卫民主人权」的阵地。从传统华团转型成公民组织的蜕变中，隆雪华堂关

注的议题从华教、义山、白小、猪农一切只关华人的课题，过渡到以华人视角议论全民议题（如 1999 年大选《华团》诉求）/ 以全民视角议论华社议题（2001 年政党收购、财团垄断中文报），再顺势提升到以全民视角讨论全民议题，如恶法废除（《内安法令》、《大专法令》等）、环保公害（莱纳斯稀土厂、武吉公满山埃采金、万挠高压电缆等）、选制改革、司法独立、宗教争议（「阿拉」字眼课题）等。

可以这么说，在 2008 年 3 月 8 日「政治海啸」席卷而来、在野党破天荒拿下五州政权之前的一段时期，隆雪华堂好不热闹，是公民社会、在野党团活跃份子一周要进出好几次的场所。来往的人流不只是华裔，还包括不同肤色的友族；论坛的媒介语不限于华语，还包括英语、马来语，甚至淡米尔语。座谈结束后，大会堂外大树下的嘛嘛档还缭绕着彼此的意犹未尽，直到深夜。

如今回看，眼尖者会发现，媒体档案中许多政治人物、意见领袖的肖像图，背景是隆雪华堂的诚毅厅；许多在《煽动法令》下受调查或引发争议的言论，发表场地是隆雪华堂，如 2013 年 5 月 5 日大选得票率与得席率不成正比导致变天功亏一篑后，社运份子、政治人物在光前大礼堂号召的抗议大会。不夸张地说，当时反抗强权、追求改变的马来西亚人，不管任

何族群、宗教、地缘背景，都能在隆雪华堂找到属于马来西亚人实践言论自由权利的空间，为上世纪华团借隆雪华堂建筑打造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赋予更深远的意义。

而隆雪华堂不再只是一个会所的建筑物，外人之所以走进来，不仅仅是隆雪华堂把门敞开，不拒人于门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建筑里的人勇敢跨了出去，把外面的人拉进来。

2008 年创立的公民社会奖与 2011 年成立的《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Gabungan Bertindak Malaysia, 简称 GBM) 是重要的突破，既不分肤色表扬杰出公民，也打造一个异中求同的跨族群平台。当领导会议、属团活动以隆雪场地为中心，加上人与人的互动产生了互信、感情，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相关团体就自然而然卷进来。当年那个「全世界拒绝你以后，你尚能找到场地空间办活动的最后希望」，如今已成为「友族一提就懂，十分熟悉、舒服自在、倍感亲切的大会堂」。

隆雪华堂成了多元的磁场，是社运中跨族群的地标之一。这个「多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修辞论述，还落实到文化、社会、生活层面的点点滴滴——佛教 / 道教徒在此办法会、印度同胞在此办婚宴、缅甸籍移工在此办聚会、地下音乐团在此办盛会、名牌企业在此办展览；在灾难、疫情期间，还是物资集聚、分类站，为弱势者、边缘族群传递温情与关爱。

隆雪华堂外在的建筑、内在的人和事，已是马来西亚建国历史长河上，一道抹不去的动人风景。

编按：本文为「隆雪华堂百年庆」系列文章，由隆雪华堂组稿，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刊登。

净选盟集会的隐形基地

饶兆颖（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副主席）撰述

「谢谢你们，你们很棒」。凌晨两点回到隆雪华堂楼下会议室看到写在白版上的留言。当时太累了也没有多加思索，拿了东西又匆匆离开。34小时的净选盟集会 4，所需物资庞大，地勤调动复杂多变，隆雪华堂成为了最重要的地勤指挥中心。当时一个电话，执行长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却不知道物资将挤满整个走廊，还有那陆续捐助来的几百箱矿泉水。我们工作人员就在隆雪华堂扎营筹备，组织和安排志工，进进出出，大门一直打着。

隆雪华堂坐落在吉隆坡的中心，距离独立广场、国家回教堂、苏丹街、Masjid Jamek 这几个主要的集合地点不到几百米，是当然的理想地点。她多年来坚持多元和开放，让这个空间汇集了不同族群不同类别的活动，没有人会因为踏入隆雪华堂而感到不适。其实隆雪华堂和净选盟已是多年的盟友，净选盟集会 3 就是在光前堂浩浩荡荡的开幕。刚好我当时是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的副主席也是净选盟集会 4 的地勤工作人员之一，这也就促成了那 34 小时的指挥中心。

适逢隆雪华堂 100 周年纪念，维兴向我要稿，就借此机会回顾和反思这场运动和隆雪华堂的参与。

近期出版由 Danny Lim 写的一本书，名为「We Are Marching Now」，记录了净选盟的缘起和集会 1 背后的故

事，有趣易读，值得推荐。理解净选盟成立时的政治背景对其后来的转型尤其重要。净选盟成立于 2006 年。当时烈火莫熄反贪运动已奄奄一息，第 11 届（2004 年）大选国阵大胜，加上在野党，尤其在伊斯兰化的议题上，有严重分歧，这让在野势力无法整合和突破。

当时的二线领导就一次在嘛嘛挡的讨论中促成了后来成立的选举改革联合工委，以选举改革成为聚合在野党的「新」议题。然而这委员会未能掀起风潮。后来邀请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净选盟的成员潜入国会大厦召开记者会正式成立。净选盟集会 1 的目的是争取不满国阵但又未必全盘支持在野党的中间选民，以选举改革议题为明，推翻国阵霸权为实，号召人民上街和平示威，开启了往后的净选盟集会。

后来的第 12 届大选，国阵失去国会三分二和五个州，许多净选盟的领袖们纷纷中选，净选盟也就此沉寂了两年。直到 2009 年，净选盟重新启动为净选盟 2.0，政治人物全退，由公民社会领导，推动选举改革。第一届主席为安美嘉，副主席 Pak Samad。隆雪华堂被选为中委。至此之后，隆雪华堂在这场运动中没有缺席过。除了是几场集会最重要的基地，她也是净选盟的领导层之一，提供意见和决策，还有不同的资源。回看那些照片，黄

衣和黄旗在隆雪华堂前集合飘扬，再由领袖们带领出发，声势浩大。

净选盟 2.0 动员了往后的净选盟集会 2, 3, 4 和 5, 形成一股庞大的社会运动。当时净选盟集会得以把各族群团结在一起，引领公众的其实是推翻国阵霸权的共识，还有净选盟集会 1 和 2 里的警察暴力，而非技术含量很高的改革议题。然而净选盟动员的背后还是以推动选举改革乃至更广泛体制改革为政治议程。这反映在影印在黄色衬衫背面的诉求，包括公平选举，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加强国会民主制度，削减首相权力等等。而净选盟集会的模式说穿了是很务实精密的计算。以人数越多而不出格，来提高警察镇压的政治代价。参与者安全，参与的人就越多。相较净选盟集会 1 和 2，后来的三场集会就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普通公民。

后来 2018 变天，许多公民社会领袖被纳入体制。净选盟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以对话的方式推动和深化各项体制改革，并坚持无党派原则，追求多党民主，朝野正面竞争。没有了集会，净选盟的工作重点放在体制研究，游说政党和议员，通过媒体主流化议题，巡回演讲等。推动选举和体制改革的初衷没有改变，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2019 年适逢 15 周年，净选

盟议决去掉 2.0 的字眼，以净选盟 (Bersih) 为名，继续推动民主改革。

2018 年变天，到喜来登政变，到后来的第 15 届大选，短短的 5 年内马来西亚的政治来一个大颠覆，两线制已不可能，换来的是多党政治，如何在这政治环境里拿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净选盟式的大集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难以复制。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如何推进民主进程，开拓更多的民主空间，以及跨族群的公共领域，是公民社会如净选盟和隆雪华堂需思考和努力的工作。

编按：本文为「隆雪华堂百年庆」系列文章，由隆雪华堂组稿，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刊登。

百年茨厂文化遗产保存行动

杨两兴（艺术工作者）撰述

2011 年国阵政府宣布在雪兰莪及吉隆坡两地兴建 51 公里长的捷 (MRT)，其中 9.5 公里是地下隧道。部分隧道将经过百年的茨厂街与苏丹街，衔接不到一公里外计划兴建中的 118 层遗产大楼，因而宣布强制征用这里 34 栋建筑。此宣布引起了该地区业主的反弹，隆雪华堂和反对党议员号召业主成立了捍卫苏丹街委员会。

（注 1）捍卫会经过了几次的拉布条抗议和尝试和当局对话都无功而返，当时侯国家基建公司（Prasarana）更表示，该公司并未蓄意毁坏茨厂街；但在国家发展下，就必须有所牺牲；1960 年土地征用法令也赋予该公司征地的许可权。

茨厂街历史沿革及其特殊意义

在一般吉隆坡民众的认知里，广义的茨厂街包括了苏丹街、谐街、罗爷街、戏院街、思士街、指天街、鬼仔巷、榴梿巷、烟缠巷、道理巷等等，而狭义的茨厂街则是指 Petaling Street 本身。（注 2）根据民间的说法：茨厂街的命名是由于当年奠定老吉隆坡发展基础的叶亚来(1837-1885)，曾经在这条街设立了木薯厂制作茨粉，虽然木薯厂只维持了两年，但后来的民众却约定俗成的把这条街称为茨厂街。

根据史料，叶亚来于清朝咸丰四年（1854 年），随同乡被卖「猪仔」到南洋来淘金。首先到了马六甲，之后辗转到了芙蓉矿厂工作，成了当地

的甲必丹。1866 至 1873 雪兰莪发生内战，叶亚来最终和马来土酋 Raja Abdullah 站在同一阵线进行吉隆坡保卫战。内战后，叶亚来二度正式被委任为甲必丹。历经战火的吉隆坡，在叶亚来的艰苦重建下、恢复经济生产，从废墟中再度发展起来。1880 年叶亚来遵照英国政府的顾问参政司制度，把行政权交给行政司，只保留了华人甲必丹的头衔，依然被赋予处理华人间争执的权利直到他逝世为止。所以茨厂街标志了华人先贤在吉隆坡的发展功绩，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有保卫茨厂街的必要。（注 3）

保卫茨厂街的抗争过程

我们正式参与进入参与保卫茨厂街的时候，也是业主产生分歧的时候，因为有关当局警告业主必须将地契交出及接受征地的事实，不然产业被强征损失惨重。（注 4）当时侯三个单位即：吉隆坡福音堂（1889）、人镜慈善白话剧社（1920）及乐安酒店（1938）决定继续抗争到底。在会议上我表明要成立一个「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的团队来为百年街区做保存的工作。

（注 5）同时也阐明我们不是为了捍卫业主产业，而是希望要保住吉隆坡文化遗产及追求社会公义。而整个捷运计划也缺乏了针对茨厂街的地段做民意调查，也没有环境评估报告及社会影响评估报告，是我们要提出的一大疑问。

初期也有一些学者和业主不很认同用古迹保存作为切入点，而建议采用土地权来作为抗争的施力点，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先例。但我本身认为吉隆坡茨厂街这一带实质上是一个文化遗产区，虽然并没有被国家划成文化遗产区，以保存文化遗产来定调抗争是合适的，就这样「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团队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社区保存抗争。其实要以什么样的名义来捍卫茨厂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如何牵动各方关注，却不被定位为华裔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阻挡国家发展就是一个难题。社区串联成了我们需要思考的事，在一个机缘下马来友人牵线，我们接触了来自马来甘榜万达达兰和印裔铁道村。这个在城市边缘的马来甘榜也曾面对相同的问题，地铁想要开进这个宁静的村庄，后来在村长的带领下计划被挡了下来，他们成功的例子鼓舞了我们。三个看起来没有丝毫关系的村镇聚落就这样连成一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其实一条栽麦河连贯了马来甘榜万达达兰和华人的茨厂街中间穿越了印度人的铁道村。（注 6）

2011 年 9 月 16 号马来西亚日我们推出了「守护茨厂」活动，一整天的活动涵盖了五脚基老照片展览、导览及绘画。当晚提灯笼游街聚集了约 500 人，开始唤起对百年茨厂的关注。2012 年初，我们号召艺术家制作征地风波的布条，在凌晨时分进行快闪将它们张挂在茨厂街一带，然后通知记者隔天早上前来报导，这些捍卫老街资讯的布条登上了一些报纸的封面。这时候捷运当局也开始有反应了，他

们在茨厂街竖立起意见收集看板，本想尝试回应我们提出疑问，民众却在告示板上抨击这项缺乏民意基础和破坏文化古迹的建设。

接著我们再接再厉，推出了《濒危文化遗产导览》，在高龄 70 多岁的马来甘榜万达达兰村的村长 Cikgu Ishak Surin 的领队下，顶著大太阳，扛着捍卫吉隆坡文化遗产的黑旗，和在野国会议员方贵伦导览即将被拆除的茨厂街建筑及在该建筑插上黑旗以示抗议。我们一共走了近 2 公里，由茨厂街一直走到同样面对拆迁问题的武吉免登。这一场活动使民众发表了「马来人也出来捍卫了，看来茨厂街有救了」的言论。这也确立了我和马来村庄及印度村庄接下来的合作。

2012 年的元宵节的前一天，我们办了年十四《灯佑苏丹街》活动，邀请民众回到茨厂社区一起度过可能是这条老街庆祝的最后一个新年。当晚约数千位来自各地的民众一起走进茨厂，观赏及参与艺术家们的演出，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保留这条老街的意愿。不同宗教的宗教师也前来为茨厂街社区祈祷，祝愿它可被保留下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当午夜降临，大家在街上唱起国歌，这个时候谐街印度庙大宝森节游行队伍刚好走到这里，三大种族及多元文化宗教就在这一刻在老街相遇了！接下来的几天，参与活动的群众纷纷将当晚的经验和想法以短片的方式上载到社交媒体 Youtube 和 FB，一时之间大家对保存老街的热情都被点燃了。

连续两年里，我们办了许多守护老街的活动，包括了制作五百尺的布条进行「移动长城」保护老街艺术行动，为社区进行大扫除，举办「百年茨厂百年月光」游街活动。当捍卫老街活动到了最后的阶段，我们再力推民办的公共咨询（Public Consultation），要求各个有关单位派代表出席对话咨询。虽然到最后没有一个官员到场，我们将整个会议过程纪录下来然后送到捷运总部要求回应疑惑。

老社区的危机一直存在

2013 年大选变天不成，保卫苏丹街的活动也逐渐陷入一种低沉的状态，乐安酒店被强行征用，大部分业主也妥协，政府在这时候也做出让步，只是拆除两栋属于政府的产业，保留了其它大部分的建筑，到此为止茨厂街暂时解除消失的危机，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也暂告一段落。然而在精武山上的 118 大楼一层层的建立了起来，预计个大楼竣工时，百年的茨厂街社区也势必将遭受另外一波更大的冲击。

2017 年 7 月捷运开始通行，茨厂街的老建筑依然屹立当地，但逃不过士绅化的进程，老行业也逐渐被一些新式的商店取代，其中一条具有在地特色的鬼仔巷的居民更被财团逼迁，将巷子打造成打卡景点，消费老街历史文化的商业操作手法到处可见。选择留在茨厂社区的我们，我们将成立于 2004 年的「失落世代」当代艺术空间搬到街区里，继续作为一个社区观察及纪录者。我们也办起一些哲学，田野调查等人文课程，我们也为一些结束营业的商店或被逼迁的社区居民

进行口述历史及保存留下来的物件，照片及文献。有别于过去的激情方式，现在的工作就有如缓缓流动地的河水，持续的在进行，近期也在筹备名为《茨厂志》的社区小志，书写茨厂街的变化，逐步发表社区口述历史及老照片发表。

老社区的危机一直存在，总会在不自觉的时候悄悄来到，而我们必须时刻警觉及作出应对。因为我们相信过去的历史造就了老社区今天景观，而今天谱写的章节也会成为明天的历史。

注

（注 1）一开始是成立了捍卫武吉免登及苏丹街委员会，后来武吉免登的征地风波在政治的周旋下解除了危机。

（注 2）茨厂街于 2000 年因为旅游业开始，人们改称唐人街（China Town），但实际上由于外来移工的涌入，大量取代了当地居民的工作，许多商家也在租金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逐渐搬迁或结业，茨厂街的居民与商家都会昵称它为外劳街。

（注 3）茨厂街是英殖民及独立前后重要的商业中心，叶亚来去世之后，吉隆坡也冒起了不少华裔重要人物如：第四任甲必丹叶观盛（1846 年－1901 年），雪兰莪州议会之华人议员陈秀莲（1845－1927）、陆佑、陆秋杰及张郁才等等。除了叶陈两人，其他的头家都是经商为主，意味著华裔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早年，叶亚来的事迹曾记载于历史课本的，而 1980 年代过后就逐渐消失在课本里，其地位也被马来土酋 Raja Abdullah 和 Sultan Puasa 取代，其实这一直是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课题，甚至马来学者之间的看法都存在分歧。

（注 4）当局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征地首先会在宪报上公布，然后按照一定的程序赔款，不过大概只会赔偿市场估价的 50%。但由于对法律上的不了解和一般民众（商家）不与官斗的心态，才有这样的一种分裂。

（注 5）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成员为杨两兴、张吉安、蓝氏君、蔡距莹、徐仪雯、梁莉思、颜思海、刘启辉及黄秀娟。参与捍卫老街的人众多，包括了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建筑师张集强及一位不愿具名的土木工程师等等。

（注 6）铁道村是英殖民时期印度南铁路工人的社区聚落，2013 年被发展商铲平，从吉隆坡最老的印裔村庄从此消失。

编按：本文刊登于《怡和世纪》第 40 期（2019 年 7 月）与《社区运动与民间实践》台马社造特展之「社区运动脉络」。

向 118 摩天大楼说不 保留区传承独立精神

谢伟伦（隆雪华堂前高级助理秘书）整理

捍卫文化遗产运动是我国近来风起云涌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遗产大厦掀起诸多非议，虽然法律程序规定政府在推行大型工程前，必须先行咨询公众，但政府却未曾针对 118 遗产大厦计划，召开过任何公共咨询。

前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麦权荣指出，吉隆坡市政厅必须依程序召开公众咨询，征询民间持份者对 118 遗产大厦与捷运计划的意见。

他表示，根据 2001 年房屋与地方政府部所推出的《总体规划与发展指导》(Total Planning & Development Guidelines)，地方政府在举凡大型项目或土地用途变更等，都必须在咨询公众咨询后方能动工。基于此，他认为，苏丹街社区要求独立遗产大楼计划的负责人，召开公共咨询会，是合理且有依据的要求。

麦权荣是在 2013 年 3 月 9 日出席由捍卫国家独立公园委员会 (Pertahanan Taman Merdeka Negara, 以下简称捍委会) 举办的「118 大楼、独立遗产计划、周边发展」公共咨询会议上，发表看法。

其他主讲人包括公共交通系统提升协会 (TRANSIT) 代表拉吉夫 (Rajiy Rishyakaran)、政治学者王建民、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社区与古迹文化保存工作者张集强、吉隆坡

之友协调员陈俊生等。逾百位关心本课题的民众参与审议。

主办单位也邀诸联邦直辖区及城市和谐部长拉惹隆仄、吉隆坡市长阿末培沙与国民投资机构代表出席咨询会，惟三者皆无出席。

不曾召开公众咨询

麦权荣指出，《总体规划与发展指导》也说明，任何计划都必须维护居民的舒适，避免发展可能带来的破坏，而且还必须尊重土地拥有者的权利，其利益必先于发展商。

「地方政府必须尊重土地原来用途……吊诡的是，市政厅是肯定明白这点的，但却不曾针对 118 遗产大厦计划召开过公众咨询。」长期研究土地问题的他，也挖掘出关于独立公园土地变更的问题。

根据土地法典，若土地用途保留为休闲或学校等，那么就只能作为此目的所使用。地方政府不能在未经咨询下就贸然变更，而独立公园所在地远至独立前就已保留为休闲用途。麦权荣指出，《土地法典》第 26 节注明无论是按照现行法律或之前法令，保留地并非政府土地，而是属于公共空间。

「政府的角色只作为看守者，以税金代人民保养与管理这片土地，所以无权擅自出售保留土地。」因此，他

质疑吉隆坡市政厅，上世纪 90 年代将独立公园售卖给发展商的做法，而遗产大厦工程更有悖《土地法典》，并认为上述两项事件都涉及土地用途变更程序，有必要召开公众咨询。

不过，由于缺乏相关资料，麦权荣未能研判市政厅此举是否属于「非法」。他提醒，「我们更需施加压力，通市政厅召开咨询会才能获取更多资讯。」

市民无法投选市长

捍卫国家独立公园委员会是由隆雪华堂等 21 个非政府组织所联合组成，发起「向 118 摩天大楼说不！」运动，以捍卫国家独立公园及毗邻历史社区。

捍委会主席依萨苏林（Ishak Surin）致开幕词表示，吉隆坡市民看见一个个文化遗产因新发展计划倒下，非常伤心。他认为，若市民不能掌握城市的动向，才算是被羞辱。「作为纳税人，我们不清楚市政厅的计划、决定，也无法直选市长。市长已沦为公务员退休前的职位。」

针对文化与历史社区的重要，陈亚才也强调，政府有必要将独立公园连同周遭社区划为国家遗产区，这一区域除了有独立体育馆、国家体育馆、还有陈氏书院。

他说，若我国能将这一区域保留下来，规划为国家遗产区，将能持续传承独立精神。「因此，我们将使默迪卡精神传承于后世。」他强调运动并非反对发展，惟时代越来越进步，却不见得人们过得更好。「进步应该是

让我们生活更好、更舒服、更有安全感，这样才是我们要求的。」

体育馆独立创先例

张集强道出独立广场与精武体育会的缘起。他说，国家独立前一年，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与马来亚奥林匹克参议会主席麦当劳（E.M. McDonald）爬上精武体育会的塔楼，为新体育馆寻找地点，眺望其东南边的加冕公园（Coronation Park），决定在此兴建独立体育场。

「马来西亚是少数几个国家在体育馆内宣布独立，且还是第一个。东姑建体育馆主旨建立新国家价值观，即不分肤色、阶级在同一平台上竞争，此谓之平等。」

隆市遗产导览路线

至于陈俊生则提出 6 条吉隆坡遗产导览路线，当务之急是恢复吉隆坡地方选举与市长选举。

「唯有民选的市长，才会与民共处，亲自下来聆听民意，而不是由人们要求会面。这样的市长才能实现吉隆坡人的要求，才会希望吉隆坡变得更好。」

陈俊生所规划路线，行走于吉隆坡老社区大街小巷，各路线主题各异，有的以鉴赏建筑为主、有的以体察社区生活为主、有的凸现多元宗教和谐共存。

虽然政府一心要兴建 118 层的独立遗产大楼，打造一个世界第三高的建筑物，但政治学者王建民引述多项

报告指出，由于吉隆坡市中心办公空间已经饱和，这项计划可能将沦为又一个「大白象」。

王建民提出三大问题，即隆市办公空间饱和、独立体育馆与国家体育馆的保护与公共空间是否足够。他列举多项报告指出，隆市中心的办公空间在未来两年，将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

其中一份报告来自于美国房地产咨询公司高纬环球（Cushman and Wakefield）。根据该报告，隆市去年第四季出现 25% 办公空间空置，比起前季增加 6.1%。当市场还未消化 2012 所制造出的办公空间，还必须面对未来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Tun Razak Exchange）和遗产大厦，将投放于市场的 470 万平方米与 300 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

王建民指出，联昌国际银行集团也分析，隆市办公空间供过于求，目前的出租室只能维持在 80%，市场已无法承担那么多的办公空间。「这让人担忧遗产大厦将会变成另一白象计划。」

文化遗产没保障

关于独立体育馆与国家体育馆的保存，他指出，虽然这两座建筑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发展商不能动其分毫，但这不是稳固的金钟罩，过去也有文化遗产瞬间就遭铲掉，例如蔡正木故居（Bok's House）。

王建民出示的《1987 年吉隆坡规划草案》还披露，吉隆坡市政厅把两座体育馆与独立公园视为综合体，

所以任何对单一的计划都必须考虑其整体的影响。

「所以，当两所体育馆列为国家文化遗产，那么独立公园也必须同时受到保护，才能维持整体的和谐。」

王建民也建议，既然吉隆坡正迈向国际都会，就必须学习国外都市，增加城市公共空间，如绿地。

「相对于其他城市如东京、温哥华、墨西哥城。隆市的公共空间是非常少的。《1987 年吉隆坡规划草案》里规划的公共空间只有 341 依格土地，而美国纽约的一个中央公园就有 843 依格，还吸引每年 3750 万人游览此地。就连寸土是金的日本东京，还保留了相当大的公共空间，单是皇家公园就有 842 依格。」

戳破捷运疏解交通迷思

针对一些人认为捷运是解决交通问题的捷径，拉吉夫则破除这种迷思。他指出，吉隆坡市公共交通的祸根，其实是缺乏巴士。

「新加坡人口只有 500 万，面积仅 710 平方公里，巴士却有 3200 辆。而吉隆坡人口已达 600 万，面积 2800 平方公里，但是巴士总数只有 800 多辆。而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Pemandu）未来的计划，只是增加多 1450 辆巴士来应付 2020 年的 1000 万人口。这是不合比例的。」

拉吉夫指出，捷运这种大型基建，在公交上有其自然的缺陷，既无法渗透大街小巷。因此，好的捷运系统必

须搭上完整的巴士系统，彼此才能发挥功效。

然而，他说，即使隆市建成捷运，也不能服务大部分的人口，因为捷运站点往往都不在步行距离内。因此，政府必须确保有足够的巴士，川行于捷运站与花园住宅区。「香港捷运系统是非常进步的，但是也没有忽略巴士服务，穿梭于城市的巴士就有 6000 辆双层巴士，还有 4350 的迷你巴士进入人狭小社区。」

此外，拉吉夫认为，治理公共交通必须考虑几点，除了公交系统的连接，还包括讯息明确、可靠、安全、承担，这些都必须放入公交的总体规划内。

「其实，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和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谈关于公交总体规划，我们一直强调巴士的迫切，但是当我们还在整理相关内容时候，就突然跳出双溪毛糯至加影捷运计划。捷运是耗费巨资的工程，而巴士却是廉宜的买卖。10 亿令吉就能添购 2000 巴士，可想象 230 亿令吉的建筑费，换做购买巴士就能满足吉隆坡的需要。」

「我们以此力争，还质问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到底是否有解决公交问题的诚意，还是想制造霸级工程而已？」

受捷运工程影响的吉隆坡福音堂代表卓汉光说，国人必须保留独立公园，将国家遗产嵌入教育内，承续爱国精神。

另一业主——乐安酒店代表林月娇批评，若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就不能与民沟通。「如此巨大工程在我们邻里如火如荼进行，却不曾咨询人民的意见。我无错于捍卫祖业，更无错于捍卫国家遗产。」

精武与华社同在

另外，雪隆精武体育会秘书长周其辉也现身公众咨询会。他强调，精武体育会与华社同在，不会背离华社队伍，坚持不出售土地。

「如果精武体育会卖了土地，将成为历史罪人，所以我们知道事情的严重。我们澄清，绝不脱离华社的团队，也不会做出些危害华社的事。」

周其辉披露，精武体育会过去土地面积为 9 英亩多，1964 年之后精武开始发生财务危机，在 1970 年唯有将一部分土地出售给一家公司、后来再转手至现在的国民投资 (PNB) 公司。

「我们也不知道 PNB 当时要发展 118 大楼……所以报导说精武出卖土地，没这回事，我们绝不出卖土地。」

「推倒」模型大楼 促保独立公园

约百位出席者在 2013 年 1 月 5 日的「向 118 摩天大楼说不!」推介活动上，从精武体育馆游行至默迪卡体育馆进行和平请愿。集会人士呼吁政府「将国家独立公园还给人民」，要求政府把当地列为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园区，拒绝破坏独立遗产的「独立遗产大厦」。

「捍卫国家独立公园委员会」主席依萨苏林在活动上，与多名党团领袖「推倒」一座由签名运动请愿卡叠成的「高楼」，正式推介此运动。

捍委会出三大诉求：

一、捍卫和保存独立史迹现址，以及作为「全民财产」的周边地标与设施，特别是默迪卡球场、国家体育馆、东姑公园和精武体育馆等代表我同独立前后的集体历史遗产，充作公共用途、全民共享、社会反思。

二、在《2005 年国家文化遗产》法令下，宣布上述区域为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并将国家独立公园（东姑公园）交还全民，恢复其公共空间，就如国家独立前一样。

三、在重建国家独立公园（东姑公园）为人民公共空间的每一个规划及修订阶段，须确立开放参与的审议管道，让社区、公众等利益相关者获得同等对话与沟通的机会。在所有该区发展建设过程中，坚守民主、廉正、透明、问责的原则。

编按：本文转载于隆雪华堂 2013 年 4 月刊《堂讯》。

占领广场：开拓民主的想像空间

朱进佳（社会主义党中委、时评人）撰述

学生自发地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走上吉隆坡街头，展开争取免费大专教育的游行示威，延续为独立广场上扎营「占领」行动，这也可算是 428 绿黄大集会的热身吧。

学生们的行动引发了各方激烈讨论关于高等教育基金贷款存废，以及免费教育可否实行的问题。对「占领独立广场」冷嘲热讽的大有人在，那些指责学生行动过激、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免费高等教育行不通」等这类为当权者及不断将教育私有化的制度进行背书之言论也层出不穷。

如果国内人均产值只占马来西亚三分二的古巴，在美国所发动的多年经济封锁下，仍然可以为其国民提供直到大学的全免费教育，甚至还孕育了不少热心尽责的医生，调派去落后国家协助需要医疗服务的人民；为何据说要在 8 年时间内摇身变成先进国的马来西亚却无法落实全免费大专教育，还要迫使学生去接受教育贷款，导致他们未毕业就欠下一屁股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不过不是这篇文章要谈的，下次我们再慢慢研究。

占领：一个时髦的抗争形式

「占领」，是 2011 年以来在世界各地颇为流行的一种社会抗争形式。埃及民众在首都开罗塔利尔广场上的

扎营抗争，最后把执政 30 年的独裁者穆巴拉克给拉下台；反对紧缩攻势的西班牙「愤怒者」，在首都马德里太阳门广场上扎营抗议，还成立「人民议会」，冲击了由资产阶级精英政党所主导的议会制度；反对金融霸权的美国民众，于 2011 年 9 月开始进行「占领华尔街」，还迅速扩散到美国多个城市，甚至爆发了全球性的「一起占领」，澳洲、英国、香港等地都出现反对金融霸权和资本主义建制的「占领」营地。

我国的「占领独立广场」，其实比「占领华尔街」还要早出现。2011 年 7 月 30 日，吉隆坡的独立广场上，第一次有人展开「占领」行动，过后几乎每个星期六都有人聚集在独立广场上进行「占领」，展开「人民议会」的讨论会，还有礼品市场、「人民野餐会」等色彩缤纷的活动。

社运交集的火花

学生争取免费教育的示威行动，跟原本的「占领独立广场」参与者，两批人两股年青的社运力量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相遇」，擦出了新的火花，为我国民主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学生和占领独立广场的参与者在广场上扎营，在那里进行「人民议会」课题讨论、设立「独立广场大学」邀请学者、活跃人士公开授课等，激活了独立广场的气氛。除了面对着天气变幻莫测下的日晒雨淋，还遭到吉隆

坡市政厅执法人员的干扰和驱逐，加上流氓匪党于凌晨时分的暴力袭击，占领独立广场的示威者却展现了坚韧不屈、不畏强权打压的勇气。

占领独立广场的人数不多，但是参与者们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与勇气，让很多人为之动容，而且很多人纷纷以各种形式去声援占领独立广场的社运人士，包括亲身到现场为那儿的学生青年们打气，也有人筹钱捐赠帐篷、药物、食物等物资给占领独立广场的参与者，让他们可以持久抗争。

在抗争中不断开阔的民主空间

自 1998 年，烈火莫熄成千上万民众涌到独立广场集会后，当权者似乎患上了让人民在独立广场上进行抗议活动的恐惧症。2007 年净选盟的第一次大集会，警方全神贯注地封锁独立广场，结果没料到群众涌到皇宫去；2008 年五一劳动节，警方还是大阵仗地封锁了独立广场；2009 年反对内安法令大集会，通往独立广场的道路都被警方封堵……不过，当权者一次又一次的阻挠与打压，并无法扑灭人民力量的火焰，反而愈烧愈烈。

民主空间，是靠社会运动承先启后的过程中不断开阔的。如果不是民间党团多年坚持不懈地争取废除内安法令，也不会有今天内安恶法不复存在的事实。如果是换在 709 之前，像目前这样如此长时间占领独立广场，可能会遭遇不同的命运。在人民力量日益壮大的时刻，当权者忌惮镇压占领独立广场会引起激烈的反弹。警方和隆市政厅不敢「轻举妄动」地采取

高压粗暴手段，只有偷鸡摸狗的法西斯流氓才在夜班三更跑来闹场。这无疑又再度开阔了公民抗命的行动空间。

「占领」运动意义深长

「占领」运动，并不像一般的游行示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动员后就散去，然后准备下一次的动员。「占领」运动，更不是那些蜻蜓点水式的「快闪」，在人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作鸟兽散。「占领」，是长时间占据着一个空间进行抗议，也意味着长时间占据了公众的视线，其所能起的影响力或可以更加持久。

学生青年们占领独立广场，既是控诉着社会建制的不公，也在提出着改变社会的诉求，落实免费教育是一个重要的诉求。此外，「占领广场」，并不只是静止在一个地方的抗议，更重要的是也在进行着一种参与式民主的实验与实践。人民议会、广场大学等另类民主实验，正开阔着我们对民主以及超越当前建制的想像空间。

「占领」路在何方？

占领独立广场路在何方？学生、青年、追求民主与社会正义的人士们，会继续扎营抗议下去？占领独立广场能否为我国政治大局带来任何改变？占领独立广场会否被当权者以强硬手段打压下去？相信这些问题最好还是由占领运动的参与者以行动去回答。单单是占领广场，当然不足以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占领行动中的民主实

践，已再次启发了人民追求民主与社会正义的新想像。

我国的青年学生在最近的争取免费教育与占领独立广场运动中，又再走在社会抗争的前线了。在 428 来临之际，尽管只是广场上一个小小的角落，但是足以掀起激荡不断的巨大涟漪.....

占领独立广场把马来西亚人民争取民主与社会正义的抗争推进另一层次，赋予我国社会运动新的气息与意义。让我们一起占领到底吧！

编按：本文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当今大马》。

走过 10 年更坚定立场

饶兆颖：法律应以罪犯修复为出发点

郑宇晴（《东方日报》记者）报道

「从 2012 年到 2022 年，这 10 年来我从对死刑和毒品半知半解到现在有深入的了解和坚定的立场，应该废除强制死刑。」人权律师暨亚洲废死联盟执行长饶兆颖原本是商业律师，机缘巧合下接触了 10 年前轰动一时的杨伟光运毒案，成为她进入这个领域的转捩点。

杨伟光案件发生时，她正在隆雪华堂的民权委员会服务，因单位为杨伟光争取赦免死刑，到外向社会大众要求签署请愿书，从而让她有一个了解死刑与毒品的机会。一直以来，许多人在看报纸时，看到这类新闻就会稍做讨论，但很快就抛诸脑后。然而，杨伟光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大家热烈参与，甚至有海外人士写信及传真其请愿书过来。「在截至的前一晚，办公室里的传真机不曾停过，一直一直为大家签署请愿书的传真进来。」从那时起，她认为是时候深入去了解这个课题。

作为代表律师，饶兆颖跟死囚家属有密切的联系，能看见他们身上那些无法被外界理解的情绪和感受。她说，死囚家属与受害者家属承受著一样的痛，甚至是多了矛盾的心理。「他们很难去表达自己，一方面认为孩子做错，也有部分是他们的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想孩子死，尤其当中可能存在著误判的缘故。作为家人，他们会

尽一切努力去帮助死囚。」死囚家属不会要求家人马上被放出来，但盼望能免于一死。

饶兆颖解释，死囚家属从家人被捕到判刑，甚至是判刑后都承受著巨大的压力。从聘请律师、筹钱付律师费到帮忙寻找证据，乃至于被迫最后四处奔波找人写赦免的请愿书、寻找社会人士帮忙等。这都是加诸在死囚家属身上的枷锁。「所以，我希望能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

虽然并非所有案件都能成功争取到不判死刑，但她从家属们身上看见他们的坚强与成长。她透露，曾经有一位女歌手倾尽全力，希望帮助弟弟逃过一死，但愿望最终成空。不过，她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反而尽力帮助其他死囚家属，盼著他人能取得好结果。

强制死刑或导致法官没有选择 法律应以修复为出发点

「有些案件在法律上是有充足的证据和动机，但这是不是表示这个人就应该死呢？」饶兆颖以沙地阿拉伯的一个个案为例，指一个外籍女佣在不堪雇主暴打下选择杀掉雇主自卫，在法律上有充足的意图、动作与证据，但女佣是为了自卫，罪不致死。然而，若法律并无给予法官裁量权的话，那

么将可能让这类案件的「加害者」遭到更坏的结局。

马来西亚 1218 名死囚中，有 73% 死囚涉及毒品，当中大部分因家庭背景或成长环境因素造成其误入歧途。「社会对吸毒的人有不好的看法，但这些人不就需要治疗吗？」若律法没有酌处权可言，只能强制判死刑的话，那么她质疑用律法惩治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惩罚还是修复，教好他们？唯有给予机会，才能达到「修复」，教育好这些人。

饶兆颖认为，如今内阁同意废除强制死刑，正是走出废除死刑的第一步，但她表示在废除的同时也必须提出相应的替代方案，方能维持国家秩序。虽然有者表示，若有选择的话，法官就不会判处死刑，但她并不认同，每个法官的想法和标准都不同，或有较为保守的法官，认为只有死刑才能警惕社会大众。因此，她认为，其替代方案必须提出一些参考制度，作为法官判案的参考。

建议修改刑事法典与时俱进

饶兆颖指出，在众多死囚中，其不存在著司法程序的争议，或因某个程序没有做好而导致误判。「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去思考如何从警方到法官都做到程序化，包括如何抑制警方贪污、证人给假口供等。」她举例，早年有一个韩国学生被控藏毒，警方第一次前来搜查时有 10 人，搜索不果就离开。但离开后没多久就再次回来，而这时就在家找到毒品。根据韩国学生的口供，第二次共有 11 人前来，而

控方律师同样在闭路电视中看见 11 人出现，并有其中一人拎著袋子进屋子。因其闭路电视片段需申请才可取出，律师只能先用手机录下，隔日回去领取时该片段已被删除。「若不是律师在证据被销毁前先用手机录下片段，那么这名韩国学生可能就要被判死刑了。」

「其实我们的律法都是殖民时期留下的产物，或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了，需要修改刑事法典。」她表示自己支持以监禁或终身监禁替代强制死刑，而这能让我国与世界接轨，国民更有人权。

每个个案都留下影响 不论成败继续争取

「每个个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进入这个领域 10 年，饶兆颖帮助不少死囚及家属争取赦免死刑，不过并非每个个案都能成功。「我帮很多个案写请愿书，就连新加坡的案子也一样，目前为止我手上并没有成功通过特赦的个案。」她透露，死囚可以申请特赦，但特赦委员会并没有固定的开会时间，并且有自己的一套筛选标准，并不容易争取到特赦的机会。

处理过的众多个案中，张俊炎的案子最让她印象深刻。由于当时张俊炎已经提供了各种资料，却还未拿到「合作证明书」，让家属倍感紧张。直至新加坡的律师给她打电话，告知已经拿到「合作证明书」，她立马通知其妹妹。当下手机的另一端忽然安静了好几秒，随之而来的是妹妹崩溃的哭声，她猜那是如释重负的哭声。说完，

她眼眶汎红，当时是激动仍记在心头，亦是激励她继续向前的动力。

「刚开始真的很挣扎，会怀疑自己在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也有人写信、打电话来骂我，问说我为何要帮助这种人。」她坦言，当初接这类个案时，曾遭到一些反弹，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不过，随著时间的推进，每一个个案都帮助她更深入了解律法和毒品，加上平日的阅读与反思，如今的她已经坚定站在自己的立场，希望能废除死刑。

虽然这条路不易走，但饶兆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许多同路人并非公开表明支持，私底下其实同意她的说法。未来，她计划与更多非营利组织合作，提升民众的醒觉意识。

编按：本文刊登于 2022 年 7 月 17 日《东方日报》。

赵明福命案的永劫回归

黄业华（赵明福民主基金会主席）撰述

赵明福逝世 14 周年的追思会上，赵明福民主基金会重温赵明福命案的疑案。

皇家调查委员会认为，从 2009 年 7 月 15 日下午 6 点抵达位于玛莎南大厦的雪州反贪污委员会总部开始，赵明福遭受了四轮马拉松式的盘问，其目的是为了让他肉体上和精神上完全疲劳。

而全程参与皇委会的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则察觉，7 月 16 日案发后，反贪会、警方和总检察署的诸多不寻常行为。

三机构行径异常

涉案的反贪会职员涉嫌销毁和修改证据、串通供词，以避免同僚被怀疑。统筹 33 个反贪会职员参与案件调查的总负责人希山慕丁哈欣，更涉嫌吩咐属下切勿揭露他是总负责人。

警方抵达现场后，反贪会职员拒绝协助调查——绝大多数反贪会职员是在参与内部汇报会后，于 7 月 17 日才开始接受调查官盘问。警方也没有即刻没收反贪会职员的手机、调查笔记、电脑和伺服器，使得他们有充分时间销毁和修改证据。

警方是在案发后，从反贪会调查官安努亚手中取得赵明福手机，证明赵明福从始至终没有被释放，与反贪会一方的说法不符。

警方在第一时间把案件归类为猝死。此外，据律师公会揭露，在警方调查反贪会所录取的赵明福供词后，全国总警长还指示调查官归还该供词，无需复印相关供词存档。而从死因调查庭的交叉盘问中可获知，只要上司没有给予指示，警方调查官就一概不闻不问。警方的不尽责、不专业、先为案件定性的种种做法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若非无能 and 怠忽职守，就是刻意为之。

据律师公会报告，赵明福逝世后，总检察署更是与反贪会职员在布城召开多次会议，「指导」反贪会职员如何给予警方供词。数名反贪会职员的口供也反常地不在警局录取，而是在总检察署完成。

警方草草了事地结案，没有从他杀的可能性调查，总检察署也轻易接纳这项调查结果。总检察署更是在验尸庭宣判赵明福案件为悬案后，向高庭申请上诉，要求改判此案为自杀。

总检察署在整个过程中，仿佛仅仅扮演反贪会辩护律师的角色。总检察署同时司职律政和检控，在本案中，明显在政府律师和检控单位的两项职权中，忽略了其公正审阅案件、依法惩处犯罪者的检控角色。

调查重启不了了之

正因警方和总检察署从未从他杀的可能调查赵明福命案，案件在这 14 年来处于永远没有终结的循环。

2014 年，上诉庭宣判，赵明福是遭身份不明的一人或多人以违法手段致死，而这些不明人士当中包括反贪会职员。

时任纳吉政府随后按照法庭指示重启调查，却于两年后以「没有刑事成分」不了了之。

警方当时仅向赵明福遗孀苏淑慧索取赵明福字迹，以鉴定来历不明的字条是否「自杀留言」，而完全没有调查反贪会职员。警方和总检察署似乎只相信一个版本的真相，即赵明福是死于自杀。

2018 年希盟执政后，时任财政部长林冠英宣布，政府将重启赵明福案件调查，但总检察署只愿意以《刑事法典》第 342 条文（错误囚禁）展开调查，与上诉庭「不明人士致死赵明福」的判决相去甚远。

经过五年的调查，警方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仍在调查中」。

摆脱永劫回归

14 年来周而复始的调查，不禁令人想起《生命不能承受的轻》中的「永劫回归」。

米兰昆德拉撰写的小说中，主人公托马斯离开了被苏联占领的布拉格，在瑞士谋得医生的好差事，却因爱人

特丽莎后来离开回到布拉格，而决定回去找寻爱人。

当时，托马斯在经过一番心理挣扎后，脑海里想起贝多芬交响乐的「非如此不可」，于是毅然返回布拉格，奈何迎来的却是一连串的悲剧。与特丽莎重聚后，托马斯因为从前批评共产党的一篇文章，而一直被秘密警察监控和迫害。

托马斯坚持不发表自我批评的声明，医院因此不得不解雇他。他跑到郊区当诊所医生，却依然被秘密警察骚扰。他只好选择当清洁工人。

到最后，他连清洁工人也做不下去，于是决定和特丽莎到乡下生活，成为载农夫下田的卡车司机。在一次意外中，他和特丽莎双双出车祸身亡。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中叩问，如果人生宛若尼采所描述的永劫回归，必须不断重演已经经历的人生片段，则任何杀戮和罪行将变得无比沉重。反之，若人生只有一次，已远去的残酷事件，对许多人而言犹如浮光片影般轻盈，道德沦丧的行为则可被轻易原谅。

托马斯的人生，就是一个自择的永劫回归的写照。他拒绝向独裁政权献媚，面对一轮又一轮的迫害，真实地活在布拉格或捷克斯洛伐克乡下。秘密警察给了他数次用谎言粉饰太平的机会，但他宁可承受生命之重，也不愿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同样的，赵明福命案就像不断重演的痛苦人生片段。14 年来，调查展开和无疾而终的结果循环不休。

如此的永劫回归下，究竟谁最终会愿意承担重责，给赵明福家属和社会一个交代？参与盘问赵明福的反贪会职员，是否有勇气说出 7 月 16 日早晨的真相？曾经在玛莎南大厦下呐喊的政治人物，又能否扛起重担，为这个永劫回归画上休止符？

米兰昆德拉写道，「前面是易懂的谎言，后面是难解的真相」。

无论如何，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应当展现强大的政治意愿，采取步骤拆开反贪会、警方和总检察署当年堆砌而成的谎言高墙，让这个被残酷剥夺生命的年轻人背后的真相曝光。

在获得真相和正义之前，我们将继续以追思会的方式，让这段悲痛的历史事件不断地重现于政府和民众眼前。我们选择直面赵明福命案的沉重，直到实现一个免于酷刑的马来西亚。

编按：本文为「赵明福逝世 14 周年特辑」文章，由赵明福民主基金会组稿，刊登于 2023 年 7 月 16 日《当今大马》。

马来西亚净选盟，十年来的感动与挫败

黄进发（政治学者）撰述

净选盟在九年内举办了五场大集会，它追求的改革到底达到多少？

2016 年的 11 月 19 日，马来西亚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The 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净选盟，又称 Bersih，马来文「干净」之意）号召第五次大集会（净 5）。尽管警方当天封锁主要路段，而且在前一天搜查净选盟秘书处，并扣留净选盟主席玛利亚陈（Maria Chin Abdullah，原名陈清莲）与秘书处经理曼迪星（Mandeep Singh），但这些举措，都未能阻止身穿黄色（净选盟官方颜色）衣物的民众，涌入首都吉隆坡市中心。

最后，不同聚集点的黄衣人还游行数公里，在国际性地标双峰塔（KLCC）前会师。从空照图按人潮面积与密度估计，全场人数应该至少有 12 万人。发言者除净选盟与传统在野党领袖，还包括脱离执政党巫统（UMNO）成立新党的前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象征政治版图的洗牌。

集会后，警方援引《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继续扣留玛利亚陈，实行单人禁锢，室内灯光 24 小时照耀，达 10 天之久。政府在制定该法令时，声明该法令只用于对付恐怖分子，这次却以净选盟曾在 6 年前接受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赞助研究与选民

教育项目为由，指控玛利亚陈勾结外国势力推翻政府，「危害议会民主」。

玛利亚陈是资深妇运分子，身为寡母，家有三子，完全不符合一般人对恐怖分子的想像。莫须有的罪名加上单独禁锢的折磨，反而激起公众义愤，在净 5 集会后第二晚，就在吉隆坡展开烛光会声援，人数从数百增加到千余人，而且慢慢蔓延到其他城镇甚至国外。

28 日晚上，获释的玛利亚陈出现在独立广场，群众欢呼「玛利亚万岁！净选盟万岁！人民万岁！」，她已经毫无疑问成为马来西亚民主化的标杆人物。监禁不但未能使她屈服，反而使她聚集更多能量。

然而，执政者显然不认栽。12 月 3 日，在巫统的代表大会上，副首相阿迈德扎希（Ahmad Zahid Hamidi，阿末扎希）宣布将成立包含警方、总检察署、反贪污委员会、国家银行的特工队，追查索罗斯的基金会对净选盟、其他公民社会团体，以及独立媒体的金援。他指责索罗斯是东欧及其他地区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而净选盟企图在马来西亚掀起黄色革命。

巫统与其盟党从 1955 年起，在马来亚 / 马来西亚连续执政。在野党三次组织联盟争取政权，都功亏一篑，净选盟这个由 93 个团体组成的公民社

会联盟，真有能力在马来西亚掀起颜色革命吗？

净选盟走过的路

净选盟正式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23 日，成员包括许多公民社会组织，但由三大在野党：伊斯兰党（PAS）、人民公正党（PKR）与民主行动党（DAP）主导。

2008 年大选，在野党取得空前佳绩，许多活跃于净选盟的领袖，纷纷跻身国会议员、州议员甚至州部长（行政议员）之列，不论时间精力或角色冲突，都无法再领导净选盟。2010 年，三大在野党同意全面退出净选盟，改由公民社会组织领袖组成其督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改名为「净选盟 2.0」以示区别。净选盟首任主席为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Ambiga Sreenevasan），原任委员留任的只有玛利亚陈和我。

净选盟的诉求（见图），从最初的选务改革，到 2013 年后的全面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马来西亚公民组织一般念兹在兹的民生课题。唯一的例外，是净选盟第四次集会（净 4）时的最后一个诉求「拯救经济」，但净选盟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经济策略，只是抨击贪污。

这个只谈「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避谈具体政策的大方向，源于在野三党最初倡立净选盟的考量。当时，在野党在国会只有 9% 议席，亟需重整旗鼓，但因为 2001 年伊斯兰党要扩大伊斯兰刑事法，

在各在野党派间造成的裂痕依然存在，各方就以利益一致的「选举改革」作为非正式结盟的基础。因此，选举改革不只是目的，也是结盟的手段。

净选盟 2.0 萧规曹随，以保持超越政党的姿态，不问意识形态，尽量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后来证明，这是净选盟能够取得正当性、争取中间选民的关键。

这个大方向有两个例外，第一是 2012 年之后，净选盟大力支持地方性的环保抗争；第二是 2016 年初，净选盟曾经参加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示威。然而，就连这两个议题，净选盟也论证出它们与选举、民主体制的关系。

净选盟（Bersih）集会的诉求

集会	净选盟集会 1	净选盟集会 2	净选盟集会 3	净选盟集会 4	净选盟集会 5
日期	10/11/2007	9/7/2011	28/4/2012	29/8/2015-30/8/2015	19/11/2016
人数	全程 5 万人	全程 5 万人	全程 25 万人	累计人次 50 万人	全程至少 12 万人
背景	2008 年大选前	2013 年大选前		2013 大选后	
组织	净选盟 (在野党主导)	净选盟 2.0 (纯公民社会组织)			
诉求	清理选民册			干净选举	
	不脱落墨水				
	废除邮寄选票	改革不在籍投票			
	最低 21 天竞选期				
			选委会辞职		
	自由与公平的媒体近用权				
		强化公共机关		强化议会民主	
		终结贪污		廉洁政府	
		终结肮脏政治			
			监督选举权力	异议权利	
					拯救经济

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玛利亚陈在 2013 年接任主席后，把净选盟的工作重点，从「选举改革」扩大到「民主化」，并在 2015 年时直接喊出首相纳吉（Najib Razak）下台的口号。这个转折有两个因素：

第一，2013 年大选，在野三党组成的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民联）赢得 51%多数票，却只获得 40%国会议席，未能执政；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国阵）只赢得 47%选票，却能以 60%议席蝉联。选后，不再期望赢回中间选民的首相纳吉，比选前更加强硬和腐败，在野党却一筹莫展，其后更四分五裂；这让许多期待改变的公众怀忧丧志。净选盟如果延续过去议程，将无法满足支持者期待。

第二，马来西亚国家投资臂膀「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掏空国库的丑闻，如雪球越滚越大，2015 年 7 月，纳吉被揭发有近 7 亿美元流入他个人户口，加剧巫统党争，连其政治恩师前首相马哈迪都已在 2 月退党。如果纳吉垮台，确立全面的改革议程就变成重中之重。

失败的改革推手

净选盟在九年内举办了五场大集会，它追求的改革到底达到多少？极少。

净选盟第二次集会（净 2）遭受强力镇压，引发民意反弹，让纳吉不得不摆出愿意推行政治改革的姿态，包括废除或修改恶法。但后来，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以发夹弯告终。

净选盟第三次集会（净 3）的十大诉求中，选委会只勉强在 2013 年大选落实了两项：不脱落墨水，和改革不在籍投票（缺席投票）。但即便是这两项改革，选委会也没有尽善其事：防止多重投票的不脱落墨水，竟然可以洗脱；军警不能自外（opt out）于不在籍投票，绝大多数平民也不能自由选择（opt in）不在籍投票。

如果看改革落实的程度，那么净选盟是失败的。然而，这些改革诉求，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纳吉与净选盟间没有双赢空间。净选盟要求的各种改革，绝大部分必须追溯到纳吉亡父、第二任副首相拉萨（Abdul Razak Hussein）在 1969 年选后族群暴乱（五一三事件）的浓烟中，对马来西亚国家历史的改造。

其时，拉萨一方面推行各种亲马来人的政策，譬如在就业、求学、购屋、拥股各方面给予马来人 / 土著优惠的「新经济政策」，实行政策绑桩；另一方面压制公民与政治权利、收编在野党、解除选区划分不均（malapportionment）的限制。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选举性一党制国家」。拉萨夫子自道：「我们所持的立场是，民主政府是最好及最能为人接受的政府形式。只要保持其形式，其内涵可按一国国情改变。」（注 1）

除非纳吉准备让国家从威权体制过渡到多党民主制，让巫统得以转型成「落败后可重来」的民主政党，否则其对净选盟的诉求，不是镇压，就是敷衍，不可能真心落实。而纳吉上台前已有蒙古女通译员阿丹杜雅

(Altantuya Shaariibuu) 的财色谋杀案如影随形，后期再有 1MDB 弊案纠缠，自无妥协的空间。

净选盟既无法逼执政者在选举或体制改革上让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支持，参与集会，而政府又视之为洪水猛兽呢？因为净选盟对政权的威胁，不在于它主观上要做之事，而在它客观上能做的事——动员中间选民，改变政治文化，打破族群藩篱。

改变政治文化，促成社会动员

马来西亚的党国体制，长期灌输「政治是肮脏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应该留给政治人物」观念，让一般人尤其是中产阶级避政治而远之。它也同时污名化在野党，冠以「不爱国」、「破坏性」、「滋事分子」、「极端分子」等标签，让在野党难以广招人才。这些宣传，也鼓励民众养成「天下乌鸦一样黑」的犬儒思维，把在野党的缺陷放大，认为即使执政党有很多问题，在野党也不会更好。

在这种「去政治化、避在野党」的氛围下，连许多在野党支持者都不敢公开表态，害怕被视为异类，甚至受到当政者报复，遑论街头示威。在官方论述中，1969 年的族群暴乱（在一般华裔眼中是「排华暴乱」），就是在野党支持者选后游行挑起的；从此，「示威」与「暴乱」便画上等号。

1998 年前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Anwar Ibrahim）被开除后，曾经爆发过一次近 10 万人的大型示威，除此之外，净 1 之前不管是「抗议物价高

涨」还是「要求废除恶法」的集会游行，一般只能吸引数百至数千人参与，而且绝大多数是在野党铁杆支持者，少有一般群众。

因此，净选盟在民主化运动中的最关键功能，是以其跨党派的态度提供「政治参与」的正当性，让不满国阵的公众，即使是不信任在野党或不愿意与其有瓜葛，也能够名正言顺反对国阵：「我不是支持反对党。我没有党派。我只是反对选举舞弊！」

在国阵眼中，净选盟就是在野党的周边组织，支援净选盟就是支持在野党，就是反政府；但在中间选民心中，「净选盟不是在野党」却是重要的心理屏障，让他们能坦然面对其他人的质疑。在 2008 年在野党取得五州政权变成「政府」后，形象大大提升，得到更多中间选民认可，这些选民自然不需要净选盟招牌的「正当性」。然而，当在野党分裂或者出现丑闻以致民望下跌时，要求净选盟与在野党保持距离的呼声，就会加强。

净选盟集会对国阵政府的最大威胁，就是把「反政府的公众」摆在街上，鼓舞更多心有不满的选民，在选举时踊跃用选票拒绝国阵。2008 年 3 月大选之所以出现几乎让国阵倒台的「政治海啸」，一般分析员都认为，是 2007 年 11 月的净 1（净选盟宣称有 5 万人参与）与同年的另外两场示威，让社会上不满政府的各种暗流汇成狂潮。

2011 年 7 月净 2 (5 万人) 鼓舞了更多人参加 2012 年 4 月的净 3 集会 (25 万人)，而后者则拉高了 2013 年 5 月大选的投票率，激励旅居海外的公民和游子回乡投票，并吸引数以千计的志工投入监票与监选工作。最终，在野党联盟取得 51% 选票，却仍输了议席，加以选后纳吉政府贪污严重，在野党却四分五裂，让反国阵选民陷入低潮。

2015 年 8 月的净 4 集会同时诉求体制改革与纳吉下台，一时成为民怨宣泄的平台，两天一夜 34 小时内累计 50 万人次参与，筹款与商品收入更达到马币 260 万余元。然而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华裔，对华裔选票已绝望的巫统完全不为所动，并在两周后发动万余人的「反净选盟、反华裔」，以暴乱威吓的红衣示威作为反制，成功用族群政治化解净 4 的气势。

2016 年 11 月的净 5，吸取了净 4 动员基础不够的教训，以火炬车队暖身，在之前七个周末兵分六路，把 1MDB 丑闻带到全国 236 个城镇乡。其间，巫统的红衣人不断滋扰、威吓甚至动武，反而为净 5 制造更多新闻。

从去年 7 月以来，纳吉成功清理党政内部的异议分子后，对政权的掌握更加牢固。净 5 的 12 万参与人数虽然逊于前两次集会，但其成功举行，且明显吸引到更多马来人参与，仍让民主党派的气势止跌回升。但是，这股气势能不能延续到下届大选（最迟后年 8 月），仍有变数。

集会的去污名，与族群藩篱的跨越

九年来，净选盟五次集会抗争的另一成果就是：集会的正当化和常态化。

净 1 和净 2，警方都以催泪弹、水炮、拳脚暴力对付集会者。净 2 时，警方在集会前一个月内，在全国各地逮捕 200 余人，并在集会当天以暴虐手段逮捕 1667 人，包括妇孺，引起舆论抨击。净 3 集会者认为，之前在净 2 镇压备受批评的警方，已被迫接受净 3 集会，安全无虞，因此气氛宛如嘉年华会。结果在集会结束时，警方仍以一小群集会者推倒围栏为藉口，进入被封锁的独立广场，强力以催泪弹、水炮驱散人群，大肆搜捕和殴打集会者。

不过到了净 4 和净 5，纵然集会人数过 10 万，过程完全和平，没有任何警民冲突。这似乎证明，大型集会已是警方不得不接受的「新常态」，尽管主办人员在事后依然被警方问话，甚至可能被提控，但 1969 年以来「示威等于暴乱」威吓论述已不攻自破。

「暴乱论述」背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群互不信任，是 1969 年后「去政治化」社会工程的关键。因此，「暴乱论述」的破产，其实也意味着国阵社会管理模式的式微。

2011 年时，国阵为了阻吓公众参与，同时打出国家暴力与族群暴力两张牌。除了由警方出面捕人封路，还让巫统周边鹰派组织「强势土著」(Perkasa)、巫统青年团，和马来武

术组织事先放话暗示，若净 2 不取消就会发生暴乱。这是为了阻吓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参与集会。

然而，强势土著头领依布拉欣阿里（Ibrahim Ali）警告华人要躲在家裏、囤积乾粮为暴乱做准备，却弄巧成拙，刺激成千上万的华人上街——一个别集会者甚至交待好后事，完全打破了「华人贪生怕死、自私」的刻板印象。当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集会者时，许多可能从来不曾与马来人讨论政治的华人，发现拉着他们逃跑、递瓶装水和盐巴给他们的，往往就是素昧平生的马来人。

净 2 当天，许多华人第一次在唱国歌《我的国家》时泪流满脸，因为「国家」从来不曾如此真实过。我后来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净 2 改变了他们的移民计划，因为这个国家值得去爱，去改变。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国家不一样，其在谈判桌上取得的独立，是少数精英的叙事；过去不曾拥有真实的，超越族群的爱国情感。吊诡的是，巫统对净 2 的打压，却让集会者在警方暴力和暴乱威胁中，得以建立跨族群的「革命情感」，感受到个人与国家的连接。

对我而言，净 2 乃至净选盟本身是一连串神奇的「插柳效应」（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我曾写道：「他们围城，却把我们围成了兄弟姐妹；他们向我们发射催泪弹和水炮，却粉碎了我们的恐惧；我们上街寻找民主，却找到了国家。」

温和路线的必然，与未来路线的思考

理解净选盟的运作逻辑，我们就会理解，其温和路线不是特定领袖的个性态度使然，而是因应马来西亚现状的政治动员思维范式（paradigm）。虽然其颜色与集会规模，可能神似欧亚大陆的颜色革命，但净选盟不是颜色革命，也不可能走向雨伞运动、太阳花运动，或阿拉伯之春的道路。最大的原因是：马来西亚是族群宗教断层线深邃复杂的双峰社会（bipolar society），逐步摆脱 1969 年 513 暴乱阴影，也不过是近年的事。

期待街头集会能一步登天终结党国体制，不但不切实际，而且危险。在公平自由选举之前，任何后纳吉的政权安排，都必须包含足够的前巫统势力，才可能站得住脚。而要足够的巫统诸侯背离纳吉，大集会就只能走和平路线，只能以人数规模去撼动体制内的人心。

台港的社会条件、西方的法治条件，马来西亚都没有。若企图以长期抗争考验政权的抗压性，或者借冲突提升公众参与，极可能只会让当权者轻易镇压，甚至扩大事端全面猎捕异议分子。而运动中比较保守的支持者，可能早已撤回支持，让人数减少的运动更容易受到打压。

如果集会不能推倒政权，也不能推动改革，那么净选盟集会还有意义吗？我们需要一再重复集会来动员中间选民吗？这样的动员，对于下届选举还会有多大影响？

净选盟成立十年，组织过五次大型集会，此刻确实必须深刻省思。希望集会更激进的公众，应思考「后净选盟的集会模式」另辟蹊径；而净选盟领导层与支持者也该思考「后集会的净选盟路线」，避免成为过去成功的囚徒。

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管理参与者与旁观者的期待。人数不可避免会成为比较标杆。但是，集会像跳高，每次都把横杆调高，那最终难免要掉下来。净 4 时最高峰时有 20 万人，净 5 在艰难环境下达到全程最少 12 万人，已难能可贵，却仍无法避免「净选盟热潮已退」的印象。如果未来还有净选盟 6 集会（净 6），它能超越或至少保持净 5 的声势吗？不管人潮如何，总会有抗争升级的呼声，净选盟要如何化解这种压力，避免较保守的支持者流失？

集会人数，乃至能否在选举中激起热情，最大关键其实是在野党声势。在野党声势强民望高，净选盟就能动员更多中间选民。在野党声势弱民望低，净选盟就会面对基层压力，要与前者切割，进一步削弱本身气势。然而，在野党强弱分合，完全不操之在净选盟。

在野党强弱分合的关键，除了政党利益与人事好恶，更涉及马来西亚社会深层的族群宗教矛盾——社会的伊斯兰化，以及优惠马来人/土著的「新经济政策」范式。例如，净 5 集会会出现许多马来人，浮现族群融合氛围，巫统便在数天后与伊斯兰党联手，再次抛出伊党党魁哈迪（Hadi Awang）

的争议性法案，寻求扩大伊斯兰宗教法庭的刑事许可权。此举，显然旨在激化保守穆斯林与其他国民间的矛盾，让走中间路线的其他在野党左右得咎。

要落实净选盟的改革诉求，政党轮替几乎是先决条件。然而，如果净选盟以动员中间选民在下届大选推倒国阵为第一要务，那么，其关怀与诉求，可能就要更注重经济民生课题，甚至协助化解族群与宗教间的矛盾。然而，如果它对选民所关心的政策与议题都有特定立场，那么它就更像政党，而非仅是体制改革的倡议团体；而它与在野党的互补功能就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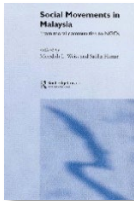
反过来说，如果净选盟以倡议体制改革为第一要务，它就可能需要重订一套针对不同社群、团体的游说计划，锁定舆论领袖们，把硬邦邦的体制改革与后者的群体利益挂钩。比起吸引数以万计临时、暂时的集会参与者，建构一个「体制改革」的「社会联盟」，肯定是更大挑战。

注

（注 1）「The view we take is that democratic government is the best and most acceptable form of government. So long as the form is preserved, the substance can be changed to suit conditions of a particular country.」引自 Michael Ong, (1987)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 The Rules of the Game*, 收于 Zakaria Haji Ahmad 编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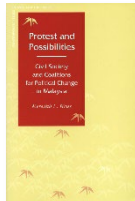
编按：本文刊登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端传媒》。

推荐书目



**Social Movements in Malaysia:
From Moral Communities to
NGOs**

Saliha Hassan & Meredith Weiss
(ed) / 2003
Routledge



**Protest and Possibilities: Civil
Society and Coalitions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sia**

Meredith Weiss / 200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slamization and Activism in
Malaysia**

Julian C. H. Lee / 2010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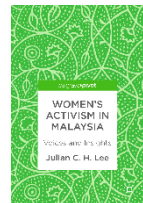
**Student Activism in Malaysia:
Crucible, Mirror, Sideshow**

Meredith Weiss / 2012
NUS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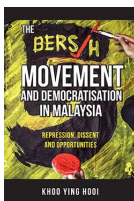
**Student Activism in Asia:
Between Protest and
Powerlessness**

Meredith Weiss & Edward
Aspinall (ed) / 2012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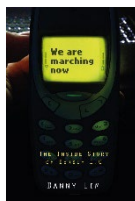
**Women's Activism in Malaysia:
Voices and Insights**

Julian C. H. Lee / 2018
Palgrave Piv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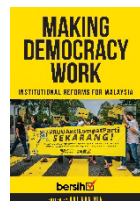
**The Bersih Movement And
Democratisation In Malaysia:
Repression, Dissent and
Opportunities**

Khoo Ying Hooi / 2020
SIRD & ISEAS



**We Are Marching Now: The
Inside Story of Bersih 1.0**

Danny Lim / 2022
Matahari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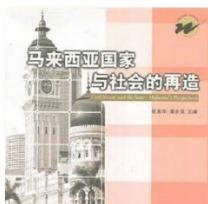


**Making Democracy Work:
Institutional Reforms for
Malaysia**

Ooi Kok Hin / 2022
SIRD



Queer Social Movements and Activism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Jón Ingvar Kjaran & Mohammad Naeimi / 2022
Palgrave MacMillan



马来西亚国家与社会的再造
祝家华、潘永强 (编) / 2007
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庙里的课堂：八年白小保校抗争记
庄白琦 (编) / 2011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当代评论 3：社区运动——我的社区我做主
许德发 (主编) / 2012
林连玉基金



风华策动：10 女社会运动分子的掏心分享
周美芬 / 2013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发展的怪兽：经济成长幻梦下的反思与反抗
杨洁 (编) / 2017
众意媒体



有些人行动：十一个马来西亚抗争故事
刘嘉美 / 2017
文运企业



黄金拾年：反山埃治金斗争史
陈慧思 (编) / 2017
劳勿反山埃治金委员会



岁月吼声 The Roar Of Time
陈弈龙 / 2023

《走读社运》工作坊讲义

编辑团队

谢光量、黄康伟、王慧仪

排版与设计

黄嘉淇

出版日期

2024 年 11 月

出版单位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民权委员会

合作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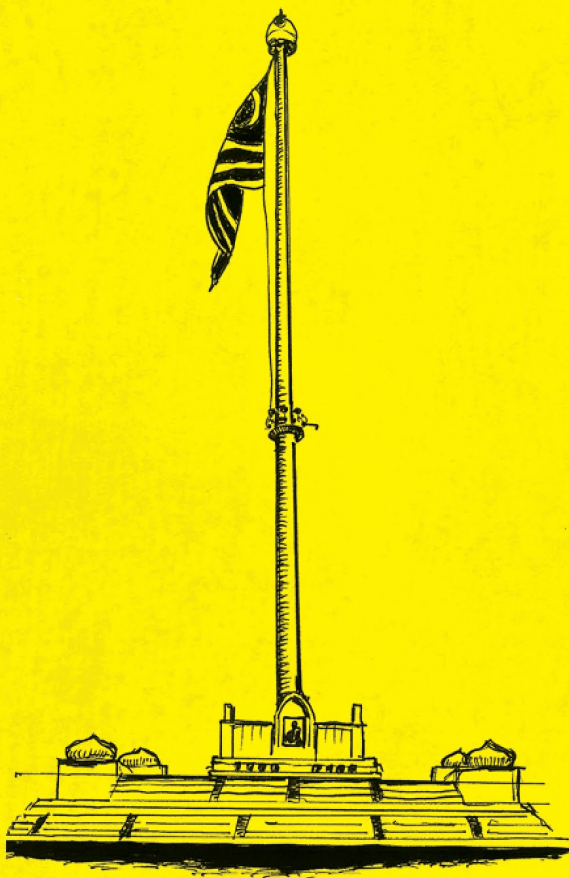
Lostgens' 当代艺术空间

联办单位

马大新青年、拉曼团结联盟、

北大前进阵线、博大前进阵线、

工大革新生



<https://klscach.org.my/> 走读社运工作坊

出版单位：



合作单位：



联办单位：

